

· 跨文化研究 ·

# 汉字文化圈缘何相当于儒教文化圈

## ——基于19世纪30年代西士对中朝日《千字文》之译介

陈 辉

(浙江大学 韩国研究所,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19世纪30年代集中出现过多个世上最早的《千字文》欧译刊本。这些译本的西方译者对中朝日《千字文》的翻译与阐释虽各有千秋,但都渗透着这样一个观点:汉字被传播到东亚的中国近邻,它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也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所吸纳,并成为其民族精神的部分乃至主体。基于这些译者的认知,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求解为何人们将“汉字文化”视为“儒教文化”的近义语,从而找到语言学家和哲学家所指的“汉字文化圈”和“儒教文化圈”概念相似的缘由。

[关键词] 汉字文化圈; 儒教文化圈; 《千字文》; 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6)03-0147-07

大凡上过中学的中国人都读过都德的《最后一课》;大凡了解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历史的学人,不会不知道日本殖民者曾经剥夺过朝鲜人民学习和使用朝鲜语的权利。侵略者不让被侵略者使用母语,其目的并不在于语言,而是企图通过这一措施来达到在精神上奴化、支配被侵略者的目的;而被侵略者反抗侵略者的去母语政策之根本也不在语言本身,而是如《最后一课》中韩麦尔先生所言:“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曾长年效力于普鲁士政府的语言学家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 - 1835)就说过:“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sup>[1]52</sup>故此,19世纪30年代,当修德、麦都思、裨治文以及霍扶迈等西士为达到他们传教和研究东方民族的目的,相继译介了中国的或者说是东方的《千字文》。他们的译文和译法不一而足,解读他们对《千字文》的理解和认识,不失为对汉字文化圈缘何相当于儒教文化圈的一种求解思路。有哲学家云:“中国与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形成了世界公认的‘儒教文化圈’。”<sup>[2]3</sup>有语言学家言:“‘汉字文化圈’包括汉族的各方言区,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邻国越南、朝鲜和日本,以及后来移居‘南洋’和美洲等地的华侨社区。”<sup>[3]12</sup>而更多的人则往往不分“汉字文化圈”和“儒教文化圈”,将两者相提并论,基于以上西方译者的视角,笔者将对此做一分析。

[收稿日期] 2006-02-2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语言与认知研究”资助项目(205000-81134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资助项目(205000-811331)

[作者简介] 陈辉(1964-),男,浙江新昌人,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语言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语言学及中外关系史研究。

## 一、19 世纪 30 年代集中问世的《千字文》欧译本

由于清政府禁止传教活动,所以,在马礼逊等 19 世纪初首批来华的新教传教士们看来,他们当时所能做的仅仅是学习当地的语言,用中文撰写宗教书籍,并进行私下传道而已。中国、交趾支那、东印度群岛华人居住地、朝鲜王国以及日本帝国的庞大人口,都使用中文作为书面语言,用中文传教是一个值得千百人来开拓的领域<sup>[4]166</sup>。因此,传教士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汇聚到了这一地区的蒙童教材中:《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进入了他们的视野,而《千字文》独特的行文结构,更是吸引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其进行翻译和介绍。

最先翻译《千字文》的是修德(Samuel Kidd, 1799 - 1843)。修德是伦敦传教会派往南洋的牧师,于 1828 - 1830 年末担任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院长。英华书院在 1831 年的《报告书》(*A Report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with an appendix, From January, 1830, to June, 1831. Malacca: Printed at the Mission-press. 1831*)附录中收录了《千字文》及其英译——*THE THOUSAND-CHARACTER CLASSIC*,并石版刻印了《千字文》原文。该附录虽没写明具体译者,但据同样来自英国伦敦传教会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67 出版的《新教来华传教士回忆录》中记述,译者就是院长修德本人<sup>[5]281</sup>。根据该附录的序言,此译本的注释和说明均译自中国人的集注,除了序言中有对《千字文》非常简短的介绍外,没有译者自己的阐释。不过,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千字文》欧译本,第一次向欧洲人具体介绍了东亚最主要的蒙学教材。

第二个译本是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 - 1857)的逐字英译本,即麦都思在 1835 年编译出版的《朝鲜伟国字汇》(*TRANSLATION OF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JAPANESE LANGUAGES*)中的附录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In Chinese and Corean*。该译本以朝鲜版的《石峰千字文》为蓝本<sup>[6]2</sup>。《朝鲜伟国字汇》中的汉语原文是一篇完整的《千字文》,但因为是“字汇”,所以英文译文是对每个汉字逐字进行翻译。为顾及语义的通顺,译者在逐字翻译的基础上还加了一些必要的介词、助词等,使前后英文单词勉强成句,试图让读者了解《千字文》全文的大概意思。另外,书中还有朝鲜语的音释及其罗马字转写,并配有汉字部首检索和英文字母顺序索引。

第三个译本是 1835 年 9 月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 1801 - 1861)在其所办刊物《中国丛报》第 4 卷第 5 期上发表的 *Tse n tse w n, or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此译本正如其标题后的提要中所言:“论及了《千字文》的格式、长度、内容、类型和作者;翻译并带有注解;在结尾处还对其进行了评论,认为《千字文》并不适合蒙童阅读,在中文初级教学中,亟待开发新的蒙学教材。”此译本参阅了修德和麦都思的译本,取长补短,将译文和注释分列,而且注释并不像修德的译本那样是译自中国人的集注,而是加入了译者自己的理解和评价,也就是“译注”,而非原文注释的翻译。

第四个译本是霍扶迈(J. Hoffman 1805-1878)的德译本,书名 *DAS TSIÄN DS Ü WEN ODER BUCH VON TAUSEND WÖRTERN, AUS DEM SCHINESISCHEN, MIT BERÜCKSICHTIGUNG DER KORAISCHEN UND JAPANISCHEN ÜBERSETZUNG, INS DEUTSCHE ÜBERTRAGEN*。译者并非传教士,他是德国的日本学家西博尔德(Siebold, Philipp Franz von, 1796 - 1866)的助手。西博尔德在日本长崎出岛担任荷兰商馆驻馆医生六年多,在日期间,积极收集了许多关于朝鲜和朝鲜语言文化的第一手资料。1833 年 12 月,西博尔德在荷兰莱顿用石版复刻了朝鲜的木版本《千字文》原文,书名以拉丁文撰写。在其复刻序言中对《千字文》东传朝鲜和日本的历史作了简短的考述,并希望此《千字文》能成为东方学爱好者进行比较语

言学和亚洲民族文字史研究的新材料。在此复刻本中,西博尔德请日本高水平的翻译给《千字文》的每一个汉字注上了日语音读,考虑到逐字翻译日语需要有大量的注释,也不利于欧洲读者阅读,所以全文逐句翻译成了日文。至于朝鲜文,由于他们没有其他可资参考的文献,所以只能依样画葫芦复刻,但模糊的原版导致他们留下了一些错误<sup>[7]245-246</sup>。此后,西博尔德便委托霍扶迈将其译成德文,并对复刻本的朝鲜语错误作了修正。霍扶迈在参考《千字文》日语译文和麦都思的英译文的基础上,于1840年完成了德文译稿<sup>[8]196</sup>。西博尔德将其收入《日本》第四卷中,并在关于朝鲜等内容的《日本》第七卷目录中,列出该译文标题。此德译本将《千字文》的朝鲜语释、日语译文以及麦都思的英译文与霍扶迈自己的德译文对照排列,朝鲜语和日语都用罗马字转写,以供读者各取所需,并对译文作出了优劣评判。

## 二、译者眼中的《千字文》之东传与东亚“共同语”的形成

如前所述,修德的《千字文》英译本只是完整地翻译了原文和中国人的集注,而麦都思的是附加在《朝鲜伟国字汇》这本字典中,所以都没有对《千字文》的历史、特点等作任何阐述。不过,西博尔德、裨治文和霍扶迈在其刻本或译本中对《千字文》的来历与东传作了一定的考述。

西博尔德的“序文”开篇这样写道:

日本史云:应神天皇15年(284年),百济国遣王子阿直岐,贡上《易经》、《孝经》、《论语》、《山海经》。时阿直岐熟读经典,皇太子师之读经。此乃本朝读书之始。天皇问阿直岐曰:“有胜汝者否?”答曰:“有王仁胜于鄙人。”遂遣使者至百济召王仁。王仁携《千字文》来朝(285年)。<sup>[7]245</sup>

此段文字显然参阅了日本最早的史书《日本书纪》之记载,但西博尔德略作了发挥。而裨治文在其译文之前,对《千字文》的历史作了这样的描述:

《千字文》的作者是周兴嗣,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最佳资料,此人活跃于公元550年前后。据六朝之一的梁代历史所云:皇帝命其大臣王羲之写出一千个字给周兴嗣,看他是否能将其编成一首诗或有韵律的作文。周兴嗣不负所望,编成《千字文》进呈其君,其君大加赞赏。另一著作言:梁朝末代皇帝武帝命所有皇子及朝廷要员写出他们可能选择的论题,然后命其中一位大臣从中选出他们所写的一千个字抄写于一千张小纸片中,混合在一处。而后,皇帝召来周兴嗣问他是否能将其组成一首诗。周立即领命,一夜撰就,但因过劳而头发全部变白。<sup>[9]230</sup>

裨治文的这段介绍显然似是而非,但主要内容基本与《太平广记》等中文典籍的记述相仿。此后的霍扶迈在其《千字文》译序中,对《千字文》作了较为合乎情理与史实的考述:

关于《千字文》的年代有两种相反之说。据《日本纪》记载,早在西历285年,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最初老师中国人学者王仁被天皇从朝鲜半岛召至宫廷之时,《千字文》被带入日本。而且据称,氏名不详的《千字文》之作者乃汉章帝(西历76-88年)时人。但更后的,显然是传自中国的另外一种说法则是:本书的成立远在更后的年代,是梁周兴嗣用王羲之的笔迹所作之文。《千字文》的日译者三子折中以上两种说法,主张有两种同名异本之书,后时代的驱逐了前时代的云云。这里,我们将《千字文》视为中国中世纪之物就足矣。<sup>[7]247</sup>

其实,关于《千字文》的问世年代、真正的作者及何时东传朝鲜日本的问题,现今的中日韩三国学者仍然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不过,有一点是不难从逻辑常理上加以推定的,即朝鲜和日本在汉字传入之前虽然没有文字,但有自己的语言。自从朝日两国假借汉字用来作为记录自己语言的符号后,汉字原本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势必会极大地影响此两国的语言,同时,此两国的语言也会反过来赋予汉字以新的文化内涵。正如西博尔德所言:“朝鲜住民有自己的语言,但由于借用了很多汉

语,以及汉字的普及使用,他们的语言严重地脱离了原有的惯用语法,被扭曲改造了。如此,古朝鲜语经历了与日本大和语相同的命运,相对于大和语只保留在若干历史学家、诗人、舞台和天皇的宫廷里,普通百姓和士大夫们的语言从具有丰富元音和音节的、流畅性的语言变成了汉语式的表现形式。<sup>[7]14</sup>

在中国古代,蒙童识字课本被称为小学的篇章,每个朝代小学篇章都有一定的变化,《千字文》问世后,即成为其后历朝历代必选的篇章内容。裨治文在其英译本的开头就介绍说:“现在我们所面对的书籍是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学校课本系列书。它们已被这个国家的人们用了数千年。此系列的第一和第二本书:《三字经》和《百家姓》,此前已经介绍给了我们的读者。”<sup>[9]229</sup>《千字文》传入朝鲜后不久,特别是到了朝鲜时代,也被列为幼童识字课本之首选,如崔世珍说:“臣窃见世之教童幼学书之家,必先《千字》,次及《类合》,然后始读诸书矣。”<sup>[10]11</sup>日本三省堂出版的《大辞林》中关于《千字文》的词条也言“平安时代后期起,被用于儿童汉字习得教育”。实际上,19世纪30年代《千字文》的欧译者们,都认识到了汉文对形成东亚三国“共同语”的作用。西博尔德说:“朝鲜与日本一样,中国文字是教养阶级的文字,尤其被使用于商用文和学术、宗教文书中。”<sup>[7]17</sup>麦都思认为:“汉语对这两个民族(朝鲜和日本)来说都是通用的。”<sup>[11]Preface</sup>在他们看来,汉字汉文在东亚的地位无异于罗马字拉丁文之于欧洲。

总而言之,19世纪30年代《千字文》的欧译者们认为,《千字文》的东传,不仅给朝鲜和日本导入了记录语言的工具,而且还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朝鲜和日本原本固有的语言,汉字所含的概念及汉文的文法习惯随着《千字文》等汉文典籍的东传,进入了朝鲜语、日语;汉字所携的文化思想也随之进入了朝鲜民族、日本民族的精神世界。霍扶迈在《千字文》德译标题后,直接引用了歌德的名言作为题记:“人们一般认为,耳闻的语言理应也是思想。”言下之意,《千字文》或者说汉字就是语言。这倒是可以作为索绪尔所说“汉字是语言”的一个理据。“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sup>[12]51</sup>

### 三、从《千字文》译介看“汉字”与“儒家文化”之关系

黑格尔在批评象形文字只为极少数人占领精神文化的专门领域而保留时曾说:“中华民族的象形文字仅仅适合这个民族的精神化诠释……一种象形文字需要一种哲学来诠释,就像中国文化通常需要一种哲学来诠释一样。”<sup>[13]35</sup>19世纪30年代的欧洲,尤其是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取得迅速发展,与其几乎同时代的黑格尔对汉字的见解势必也影响了同为德国人的西博尔德和霍扶迈对汉字的认识。他们“为了对比较语言学有帮助”,在编写《词汇》,复刻和翻译《类合》、《千字文》时,都附上了汉字原文,以及每一个汉字的朝鲜语之音与释、日语的音读和训读或译文。西博尔德认为,朝鲜人和日本人一样,对汉字都有两种读法。他说:“此两国国民几乎与中国人一样,学习了阅读中国文字,但与其同时,还将文字中所含的某一概念用其母语译读表达。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进行那样一种翻译,是因为依据了某一文字的概念,而并非此文字的发音。所以中国文字成了北亚诸民族的共同文字,同时,其语言虽然在口语上有不同,但基本上也成了共通的语言。”<sup>[7]25-26</sup>然而,当他们将《千字文》翻译成日文和德文时,为了回避几乎需要对每一个汉字作注释的尴尬,采用了依句翻译,而非逐字翻译的方法。西博尔德说,这样做是“因为一千个字每字只出现一次,对这一千个字逐一加简短的说明,即便对中国人而言,多少也有些困难,何况对我们的语言学者而言,无疑会成为一篇处处暧昧不明的文章”。霍扶迈说:“并非所有《千字文》的一切同一程度地吸引着我们,我们将地志性的、历史性的隐喻委托给中国人吧,我们关心的是其表现方式上体现出来的汉语固有的言简意赅与如诗似的跳跃相结合的名句、箴言之类的东西。”<sup>[7]246,249</sup>在西博尔德和霍扶迈看来,《千字文》所蕴

含的不仅是单纯的一千个汉字而已,它还包含了地理的、历史的和文化性的内涵,西方人要解读所有这些内涵有着相当大的难度。那么,此种内涵需要由何种哲学来加以诠释呢?

众所周知,虽然道教、佛教、神道、东学在中朝日三国分别有过一定的兴盛期,但在文化主流上,尤其是在典章制度、文史经学方面,儒学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中朝日三国士大夫们选择《千字文》作为蒙童的首选教材,除了《千字文》由不同的一千个汉字押韵成句这种独特的篇章结构以外(“洁”字在文中出现了两次),其所包含的儒家“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也是蒙童在修读《四书》《五经》之前所能配套的极佳的启蒙教材。裨治文认为,《千字文》的主要内容言说的就是“人”及其“义务”。孔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儒学实质上就是“人”学。可见,在裨治文等西人眼中,《千字文》所表述的主要思想无疑就是儒家之说。所以,西博尔德在其《千字文》复刻本序言中,除《日本记》等日本史书中确有记载的《论语》和《千字文》之外,自己硬生添出“百济国遣王子阿直岐向应神天皇上了《易经》、《孝经》等儒家经典”的说法来。

裨治文对《千字文》的注释大多也基于儒家的思想,他对开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就作了这样的注释:此句虽没有直接阐述中国的天文思想,但已足以说明,当所有物质存在时,最轻微精致的上浮成其为“天”,浓密的、混杂的下沉形成“地”,前者是圆而玄,后者是方而黄;地之上下左右谓之“宇”,即天穹,最远古时业已存在的时间称为“宙”,即包容,所以,“宇宙”指的就是一个铺盖的天穹和包容的时间;天和地产生于一切事物的原始本体,天地呼吸消长之交融形成一年四季,冬季正是此种交融的暂停。裨治文的这种注释可以说完全与董仲舒的“元气”说相吻合。

裨治文还认为,正是由于《千字文》每个汉字都是概念,每个小句都有丰富的内涵,所以除非强制,否则蒙童很难愉快地完成此种繁琐的学习任务,它并不适合儿童的基础教育。裨治文在译介完《千字文》后,最后感叹说:基础教育阶段很有必要有新的教材出现。他的这种感叹与韩国朝鲜时代的汉学家崔世珍之感受颇为相似。崔世珍说:“《千字》,梁朝散骑常侍周兴嗣所撰也。摘取故事排比为文,则善矣。其在童稚之习仅得学字而已。安能识察故事属文之义乎?”<sup>[10][11]</sup>于是崔世珍为朝鲜蒙童新编了《训蒙字会》,麦都思等西士编订了易于识读的中文、朝文、日文、越南文等文字的罗马字转写法。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为近一个世纪后的中国白话文运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应该说,今天小学新生用汉语拼音开始启蒙教育,客观上也有麦都思等西士之一份功劳。

## 四、结 论

依据以上欧美人士对《千字文》及汉字的认识,我们可以认为,汉字并不单纯是汉语的记录符号,其本身也是一种语言符号,有所指和能指。索绪尔认为,自然语言这一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那么,笔者认为,汉字这种符号就是概念和书写形象的结合,由于它与音响形象的关联远不如拼音文字,所以,汉字可以为汉语以外的民族语言假借作书写的符号。在被他民族语言假借作书写符号的进程中,汉字符号的所指不可避免地也被植入了这些民族的语言之中,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文化思想。而用来阐释汉字以及汉字文化的中华哲学思想的主流乃是儒家文化,假借了汉字作为语言书写符号的民族区域之文化思想,其主体也不可避免地由儒家文化来承担。只不过儒家文化在这些他民族区域有了本土化的发展,正如这些他民族语言将汉字为自己语言所用时对汉字的读音、意义等作了本地化的变更一样。因此,将汉字文化视作儒家文化的近义语,大抵没错。

当然,视角的不同,对东亚和东南亚的部分地区自然会有不同的称呼,如“东亚文化圈”、“稻作文化圈”、“儒教文化圈”、“华化佛教文化圈”,等等。不过,这些称呼有着一个交集,那就是汉字这一“符号”。除中国外,朝鲜、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等国曾经或至今仍在使用汉字或汉字型文字。如冯天喻所说:“汉字千百年间在这一广袤地域是通用的官方文字和国际文字,中国式农业及手工

业技艺、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均由汉字记述与传播,它们共同组成以汉字为信息载体的‘汉字文化’。所以,这一区间最传神的称号是‘汉字文化圈’。<sup>[14]</sup>

在哲学家看来,20 世纪初的西方哲学呈现了“语言”的转向,而德里达推出《论文字学》,堂而皇之地宣布了“文字”的转向<sup>[15]85</sup>。如若此文字的“转向”成立的话,那么,其肇始当可上溯至 19 世纪 30 年代的西士之集中译介《千字文》,甚至更早。

### [参 考 文 献]

- [1] 威廉·洪堡.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姚小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2] 朱仁夫,魏维贤,王立礼. 儒学国际传播[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3] 周有光. 周有光语文论集:第 2 卷[M].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
- [4] 吴义雄.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M].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 [5] ALEXANDER W.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M].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1967.
- [6] 鄭光. 朝鮮偉國字 L [M]. 서울:弘文閣,1978.
- [7] シ 4 ボルト. 日本:第 5 卷[M]. 尾崎賢治,譯. 京:雄松堂 店,1978.
- [8] 小倉進平. (増訂)朝鮮語学史[M]. 서울:刀江 院,1986.
- [9] BRIDGEMAN E C. Tse m-tsz-e-w n, or th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J].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5, VOL. IV-SEPTEMBER (5):229 - 243.
- [10] 崔世珍. 訓蒙字 [M]. 서울:韓國檀國大學校出版部,1971.
- [11] PHILO S. TRANSLATION OF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CHINESE, COREAN, AND JAPANESE LANGUAGES[M]. BATAVIA: THE PARAPATTAN PRESS,1835.
- [12]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13] 雅克·德里达. 论文字学[M]. 汪家堂,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 [14] 冯天瑜. “汉字文化圈”当议[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1 - 6.
- [15] 潘文国. 字本位与汉语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Why is Sino-graphic Cultural Sphere the Synonym of Confucian Cultural Sphere ?

—A research on the Westerner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 the 1830s  
of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in Chinese, Korean and Japanese

CHEN Hui

(Institute of Korean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Linguist Wilhelm von Humboldt once said that the national language is the same as the national spirit, while the national spirit is the same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In the 1830s, Samuel Kidd, Walter Henry Medhurst, E. C. Bridgman, and J. Hoffman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ory notes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into English, Latin and German for their missionary work and Oriental studies. Each of their translated versions with interpretation, having their respective merits, conveys the message: Along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introduced into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East Asia, Chinese culture, especially Confucian culture conveyed by Chinese characters were also absorbed by these countries and nationalities, becoming

part or even the principal part of their national spirits.

Based on the these European and American translators' understanding of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and Chinese characters, we may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not only a kind of signs for record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but also a kind of language with its own property and its own signified and significant. Saussure argued that the natural language is combined by the concept and the acoustic image. Then, this author thinks that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combined by the concept and the written image. As Chinese characters are entirely different from alphabetic handwriting, which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acoustic image, they can be borrowed by other nations to record their national languages. When Chinese characters are on loan by a foreign nation, the signified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ould inevitably be implanted into the native language of the nation, thus extending their influence over its culture and ideology. Furthermore, since it is Confucian culture, regarded as China's mainstream ideology, that is used to interpre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Sino-graphic culture, the dominant culture and ideology of the nations which borrow the Chinese characters would inevitably be dominated by Confucian culture. Therefore, the argument is justifiable that Sino-graphic culture is the synonym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this connection, some philosophers say that China, North Korea and South Korea, Japan, Vietnam, and Singapore have formed the Confucian cultural sphere, which is acknowledged by the world. Some linguists say that the Sino-graphic culture sphere includes all the dialectal areas of the Han nationality, some of China's ethnic areas, such Chin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as Vietnam, Korea and Japa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Nanyang) and Americas. Usually, most common people do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Sino-graphic cultural sphere and the Confucian culture sphere. Very often they take the two concepts to refer to the same notion. If our view i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se Westerners who had introduced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we will not fail to understand why the Sino-graphic cultural sphere is usually regarded by these philosophers and linguists as the synonym of the Confucian cultural sphere.

**Key words:** Sino-graphic cultural sphere; Confucian cultural sphere; *Thousand Character Classic*; translation

本刊讯 2006 年 4 月 10 日,首届“两岸应用经济与管理学术研讨会”(杭州站)在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报告厅成功举行。本次研讨会由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CARD)、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科技大学、台湾中兴大学共同主办,目的在于加强两岸学术交流,共同提升学术水平。来自台湾中兴大学、台中技术学院、台湾朝阳科技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单位的八位代表分别就农业经济的土地规模效率、土地证券化、农业专业合作、农户参与订单农业、农业的自动化与电子化、环境问题及金融机构效率评价等议题作了精彩的报告。通过本次交流会,两岸学者均获益匪浅,不仅在学术上互相促进,而且也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为以后进一步开展两岸合作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